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朱耀廷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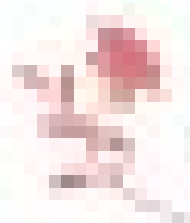
北京文化史 研究

BEIJING WENHUASHI YANJIU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项目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文化史 研究



BEIJING WENHUA SHI
YANJIU

（北京文化史研究）

北京文化史研究



光明学术文库
GUANGMING ACADEMIC SERIES

朱耀廷 / 主编

北京文化史 研究



BEIJING WENHUASHI
YANJIU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项目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化史研究/朱耀廷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06-586-4

I. 北… II. 朱… III. 文化史—研究—北京市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739 号

北京文化史研究

著 者:朱耀廷

出 版 人:朱 庆

责任编辑:田 军

封面设计:何成宝

责任校对:徐为正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34(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昆仑律师事务所陶雷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690×975 毫米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22.5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6-586-4

定 价:46.00 元

北京文化史研究编委会

顾 问：张传玺 徐苹芳 孔祥星 赵 书

主 任：朱耀廷

副主任：韩建业 顾 军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云松 左芙蓉 朱耀廷 赵连稳

杨靖筠 杨丽华 顾 军 韩建业



序言

谈谈北京文化史研究

朱耀廷*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中所体现的十大特色,其中包括地理环境特色:勾通与交流——雄踞北国,四通八达;民族环境特色:从冲突、交融走向统一,从你死我活到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城建规划特色:汉制为主,联合共建;宗教文化特色:海纳百川,众教并存;民俗民风特色:多元化、多层次,四方会同,垂范九州;经贸文化特色:保证供应,服务宫廷,老字号,名满京城;皇家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文学艺术特色:百花齐放,名传天下——京味、京腔与京剧;育才选才特色:“学好文武艺,售予帝王家”。

〔关键词〕 北京文化史 十大特色

2001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纲要》曾经提出:“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北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应有一批高水平的,具有浓厚北京历史文化特色的研究成果。”当时,经过几个五年规划,经过各单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北京市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若干可喜的成果,多卷本的《北京通史》和《图说北京史》均已问世,关于北京城市建筑、文物古迹、民俗、宗教方面也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和通俗读物。但北京作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名城和文化古都,却还没有一本高质量的北京文化通史或分卷本《北京文化史》。为了使国内外人民进一步加深对北京文化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北京文化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以及北京历

* 朱耀廷,男,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曾留校任教。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专门史学科带头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出版各种著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要著作有《成吉思汗传》《正说元朝十五帝》《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通论》《北京文化史》等。

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由本人负责,以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学研究所名义申报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2006年初完成了其中5本书的写作任务并正式结题,2006年下半年为了继续完成分类研究中的其他任务,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又给我们下达了进一步研究的任务。

根据市规划办的要求,我们计划编写一套学术专著——《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其中包括概论卷:北京文化史的性质与特征,内涵与演变规律;城建规划卷,主要研究北京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辽金以来五大古都的城建规划与文化内涵;皇家文化卷,主要研究宫廷文化与王府文化;市大夫文化卷,主要研究官僚士大夫与书吏文化;民风民俗卷,主要研究北京地区的民风民俗、衣食住行以及里坊村社、京旗、京郊文化等;宗教文化卷,主要研究北京历史上的各种宗教教义和宗教建筑;文学艺术卷,主要研究北京地区的语言、文学、诗歌、戏曲、绘画、艺术;科技文化卷,主要研究北京地区的科技成就;学术教育卷,主要研究北京历史上的学校、书院、试馆、科举、出版、印刷以及学术流派;民族文化卷,主要研究北京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情况和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对北京发展的贡献;商业文化卷,主要研究北京地区商业文化的特点如老字商号;中外文化交流卷,主要研究北京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的相互影响。以上分类不一定科学、全面,但它却从一个角度说明,北京文化史特色鲜明、亟需研究,为了进一步认识北京文化史不同于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古都文化史的特点,进一步促进北京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北京文化史研究所计划陆续出版《北京文化史研究》论文集。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对北京文化史特色的基本看法,是为序。

一、北京文化史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北京从原始聚落到形成城市,从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跃升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都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故而北京文化史也经历了一个由北方多民族文化到方国文化,再到北方军事重镇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发展过程。辽代将幽州定为五京之一,号称南京,此后为金中都,元大都,直到明清的北京,民国时期的北平,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在这一千余年的历史中,北京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东方文化的缩影。

1.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



纵横数万里。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在本人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论》一书中,我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性,我认为这些特性自然也是北京文化的主要特色。

其一是它的延续性、凝聚力与包容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族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以及蒙元文化、满族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第二,以人为本,重人伦,重道德,尊君重民;第三,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第四,强调人格,提倡节烈,主张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第五,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第六,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和谐;第七,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儒、佛、道三教合流;第八,务实事,轻玄想,重实用,戒空谈,看实效,重实绩,主张经世致用^①。

2. 北京文化史的内涵

我认为,北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我国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具有兼容性、包融性、混溶性、集大成性、正统性、稳定性等 6 大特征。正如《北京文化史》的作者之一方彪先生所

指出的那样,所谓“兼”指的是客观上共同存在;所谓“融”则是主观上互相承认。“兼融”文化就像酒宴席上的拼盘,既各自保留自己的特色,但又组合到一盘之中。从整体来看,“丰富多彩”颇能引起人们的食欲;从个体来看,色、香、味仍然各有千秋。相对落后的文化和相对先进的文化能够长期共存,在兼融中各占一席之地,这是政治、军事因素作用的结果。

所谓包融性对于主体文化而言,“包融”是一种“吸收”,但“吸收”并不是“消化”,对主体文化来说,“包融”是一种融入,融入后在主体文化中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有些像酒宴席上的什锦火锅,各种非主体文化在主体文化中“涮”了一下,经过了“热处理”后,色、香、味均附上了主体文化的主导方向,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包”就是“包含”;“融”就是“融合”。包含不是包溶;融合不是溶解。

所谓混融性,则是反映北京历史文化的又一特征。历史上北京地区的多元人口,在多元的地理环境中所创造的多元文化在兼融式、包融式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却走上了混溶式发展的道路。所谓“混”就是“混合”;所谓“溶”就是“溶解”。从北京史的角度来讲,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的文化随军进入北京地区后,在一定阶段内曾经以兼融、包融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但当这些民族失去统治民族的地位后,其文化则迅速地“汉化”,混溶到汉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北京地区的汉文化也不断地“胡化”。“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胡汉互化应该看作是文化上的“混溶”。

由于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因此北京文化自然具有集大成性。这种集大成性的核心是指各种文化在北京认同。北京文化是在兼容、包融、混溶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不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它是建立在京师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京师政治、经济对各种文化的认同具有制约、指导的作用。辐凑进京的各种文化浸淫在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之中,迅速染上了京风、京韵、京味,使认同有了进一步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在北京实现了大认同。九州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多民族大统一的坚实基础,京师文化的集大成性则是九州文化共同体的一个缩影,它体现了九州文化共同体的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北京文化的集大成性是建立在兼容性的基础之上;从文化内涵上看,北京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性更是建立在包融性、混溶性的基础之上,没有博大精深的包融性与混溶性的文化底蕴,是不可能承载这样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

所谓正统性,则是北京文化的主要特征。建立在京师经济基础之上的京师

文化,在京师政治的制约、指导下当然具有正统性,它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学统、皇统的正宗文化。当然,在这种正统之中既有封建主义的糟粕,亦有合理的内核和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

另外,北京传统文化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北京在时空上的稳定性、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使得北京传统文化亦具有稳定性。北京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取决于她自身具有深厚的积淀和底蕴。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但唯我华夏文明于时间上没有间断过,于空间上没有改变过,北京传统文化集华夏文明之大成,亦承袭了华夏文明的稳定性,一部北京文化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写。

北京传统文化的六大特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铸就了北京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性——海纳百川,博大精深;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正统所在,正气所钟。北京传统文化的特征,使得北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其他城市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前工业社会里,尽管建都北京曾经造成经济上的沉重压力,可是北京仍然成为元、明、清三大一统王朝的不易之都,这与北京文化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中所体现的十大特色

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内容十分丰富。经过多年研究,我认为从分类研究的角度看,北京文化史可以概括为十大特色:

1. 地理环境特色:勾通与交流——雄踞北国,四通八达

北京地处燕山南麓,“左负辽海、右引太行”,南压华夏,雄踞我国北方;同时还有历代建造的万里长城,“喜峰、居庸、拥后翼卫、居高驭重,临视乎六合”^②。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地区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③,成为勾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也是几千年来中原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碰撞、融合的最前沿,从而导致了中原农耕民族与蒙古草原民族以及东北民族的冲突与交流、统一与融合,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 民族环境特色:从冲突、交融走向统一,从你死我活到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门头沟区东胡林人遗址、房山区镇江营遗址、上宅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

特征,但也有明显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历史刚刚跨入文明时代时,传说中的黄帝曾联合炎帝与九黎族进行了涿鹿之战,后来又与炎帝进行了阪泉之战,战胜了炎帝。从此炎黄二族融为一体,组成了华夏族,占据了中原一带;夷、狄、苗、蛮等少数民族则被迫居于祖国的边疆。

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北京地区居住着多个族群,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共存,构成了三千多年前北京地区青铜文化的特色。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多民族和平共居,则是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在燕山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数百座,尤其是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墓地,出土了成批具有北方少数部族特征的器物。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蓟为广阳郡治所。为防御北方匈奴人南侵,秦朝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自汉至隋,此地或为燕王、广阳王封地,或为幽州。隋朝时曾改名为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成为运河的北端,从此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隋炀帝三攻高丽,蓟成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唐太宗东征,也是在蓟城南郊誓师。后来安禄山出任范阳(即幽州)节度使,正是依靠这一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动了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 and 北京地区的历史进程。此后,这一地区成为汉族、突厥、契丹、奚、靺鞨、室韦、高丽、回纥、吐谷浑等各族人民生活 and 劳动的地方。

自五代、宋朝时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与此相反,北方、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却相继发展壮大起来。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甘心充当儿皇帝,将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从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北方的屏障,辽朝却成为中国北方强大的政权。辽以幽州为其南京,改称析津府。在辽的五都当中,南京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辽南京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社会发展程度、繁华富庶居辽五京之首。而以南京为代表的燕云农耕区,不仅是契丹“番汉分治”的统治中心和贸易中心,也是契丹人汲取汉族文化,南下逐鹿中原的基地。契丹兼并燕云十六州后,设南面官与北面官,“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④。北面官负责契丹、奚族等事务,南面官分管汉族事务,并在南京设置留守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辽南京传统的生活方式渗入契丹草原文化的因素,产生了面貌一新的城市文化。随着南京在契丹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与影响也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逐步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



过渡。

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女真人分批迁入中都和中原汉地,与原辽、宋各族杂处错居,逐步汉化,接受了农耕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多数人“浸忘旧风”^⑤,“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⑥。它说明,海陵王迁都中都促进了当时的改革,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为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元朝与清朝也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要想有效地统治全国,必须与汉族的统治阶级结成联盟,并且不能以他们的龙兴之地作为全国性的首都,无论是东北的会宁府、沈阳,还是漠北、漠南的和林、开平,都不足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多民族国家之都;甚至河南的开封,江苏的南京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勾通南北、团结各族、统一全国的任务。850余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北京才是最合适的“民族融合,祖国统一的中华之都”。

3. 城建规划特色:汉制为主,联合共建

董家林古城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城址。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燕国统辖疆域达到极盛,商贸经济遍及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蓟城是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中国的名都。从蓟城到广阳郡再到幽州,其城市建设主要受中原的影响,基本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市,它为辽代南京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938年,契丹(辽)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1151年,海陵王下诏迁都,令张浩等在燕京故城的基础上,参照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改造、扩建新都城。1153年三月,海陵王正式迁都燕京并更名为中都。为对新都起到固本培根的作用,1154年又将金祖宗陵寝迁于中都。海陵王迁都不仅是北京建都之始,客观上也适应了经略中原和民族融合的需要,对金的发展和燕京地区的开发具有积极意义。

13世纪中叶,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至元八年(1271),正式建国号为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从此,大都城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大都的总体布局,采取了传统的以宫为中心的分区规划机构形式。在规划格调上,则因据太液池和积水潭确立宫殿及主体市场的规划位置,形成了宫南市北的格局。元大都的规划与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家政治理想的蓝图付诸实现,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⑦北京旧城的城建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为世界所少见。从此,中国的中

央王朝(明清)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城建城规划突出反映了如下几大原则:

辨方正位,为天下本;中轴布局,左右对称;象天法地,敬天法祖;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龙的世界,君权神授;阴阳五行,象形化生;城门宫殿,取意乾坤;九坛八庙,阴阳相交。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正式迁都北京。北京的都城文化日益走向成熟与繁荣。为营造帝都北京,明朝疏浚了连接江南的大运河,水陆交通更加通畅,各地的商品和物资川流不息地运到北京,北京成为全国物资交流的中心。京城逐步形成独具东方神韵、富丽繁华的大都市。满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定都北京。北京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中心。康雍乾时期的北京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富庶、繁华、壮美的大都市。

4. 宗教文化特色:海纳百川,众教并存

应有尽有、和谐共存,是北京地区宗教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佛、道、儒三教合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含天主教)、萨满教乃至民间信仰的小宗教等,在北京地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建筑或一定的遗迹。

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蓟城地区,蓟城成为佛教重要的聚兴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潭柘寺和北魏太和造像,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北周武帝灭佛并未波及幽州地区,隋唐时期幽州创建了许多新的佛寺、经幢、佛塔及造像,尤其是房山石经的镌刻,使幽州成为中国北方佛教的传播中心。此外还有房山圪里乡万佛堂,悯忠寺(今法源寺)等。

契丹族原来信奉原始的萨满教,随着王权的确立和统治的需要,佛教在辽地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南京地区佛寺众多,名僧云集,寺院经济空前发展。《契丹藏》的编校雕印、房山石经的续刻,是当时佛教盛行的反映。辽朝还兴建了一大批佛寺,如西山大觉寺,京西马鞍山戒台寺,云居寺北塔、南塔,天宁寺塔等。

从元朝成吉思汗、忽必烈起,就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允许各种宗教在元朝的首都自由收徒传教,自行建筑庙堂、宫观、礼拜堂和清真寺等,它们是北京地区民族交融及中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兼容并包的中华帝都文化的文物遗存。它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

明朝的北京,一如前代,多种宗教盛行。清代统治者对宗教的政策也是兼容并蓄,寺庙宫观遍布京城内外。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兴建了许多喇嘛庙。其中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庙宇,是蒙、藏地区活佛僧众在京礼佛的主



要寺院。

伊斯兰教建筑则有东四清真寺,马甸清真寺。天主教建筑有南堂、东堂、北堂、西堂等。

在北京的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佛、道之争,但北京地区的各教各派基本上是相安无事,互相尊重,互不干预。宗教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交流、融合,应该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建立和谐社会的比较理想的办法,北京地区宗教与民族的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5. 民俗民风特色:多元化、多层次,四方会同,垂范九州

北京地区的民风民俗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燕地的婚姻习俗明显与中原不同,其音乐、舞蹈也具有边疆地区的特色,《管子》说“其民愚黠而好贞,轻疾而易死”^⑧;《吴子》曰燕人“好勇义,寡诈谋,故陈守而不走”^⑨,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正是春秋战国时这一地区的民风特色,而纵横家、方仙家的出现则使这一地区在诸侯争雄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被中原诸侯刮目相看。到秦汉时期,这一地区仍然被视为北国,其民风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汉书·地理志》说:“燕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⑩至隋唐时燕地文化已相当发达,先后出现了高适、贾岛等著名诗人;辽代的南京城已经成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原文化顺利地在此传布,从而形成知礼义、讲淳朴的风习。与此同时,大量北方各族人口的不断进入,又带来了北方各族的不少习俗:义勇无畏、仗义疏财、阔达豪放等道德观念,实现了有机结合,形成特有的风尚;金朝迁都燕京,以及女真屯田户大批南迁后,女真人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乃至节庆信仰方面逐步与汉族接近,进一步忘掉女真旧风,形成了民族文化融和的局面;至元明清时,北京地区的臣民已经是“辇毂之下,亲承日月之末光”^⑪天子脚下的百姓,其民风民俗自然也变成了“首善之区”的上等风习了。但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各个民族,故而民风民俗也体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

《北京文化史》的《民俗文化史卷》概括了北京民俗的五大特色,其一认为北京民俗是多民族长期融合、凝聚的结果,它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内涵;其二是民俗、信仰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风俗民情;其三是,北京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充实和更新;其四是北京民俗文化大多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其中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影响比较突出;其五,北京是我国近千年来的首都,是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故

而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整体水平。

6. 文物遗存特色:多元一体,集珍荟萃,东方明珠,世界之最

北京地区的地下遗存无比丰富,从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四五万年前的新洞人,两万七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再到两万年前的王府井人,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以及代表新石器时代的上宅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等,它不仅说明北京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地区不仅地面文物古迹众多,而且地下的文物埋藏也十分丰富多样,贯穿了从远古到近代的文化遗存层面,这在国内外城市考古中也是很少见的。

北京地区的文物古迹已有一千余项被确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5项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0余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0余项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又确定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自古至今,国内外人民向往北京,对于北京的文物古迹曾有“燕京八景”、“北京十大名胜”、“北京新十六景”以及“北京名胜世界之最”等种种说法,它充分说明北京地区的名胜古迹的确有不少东方明珠、世界之最。

7. 经贸文化特色:保证供应,服务宫廷,老字号,名满京城

北京地区的经济与商贸文化也具有明显的特色:以崇尚“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从商之源,在经商中坚持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同时又冲破了儒家言义不言利的道德樊篱,建立起重利尚义的价值观念,恪守商业道德,不以利害义;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现实又使中国商人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出迷恋权力的趋向。此外悠久的历史 and 京韵文化也打造了京商文化鲜明和独特的异质性:“和”文化造就了京商的平和与稳重,恬淡和安闲;礼仪之都的繁缛礼节被京城的商人们所发扬,使北京商人以热情周到,有礼有节而著称;北京的商人们重视规则,大多数店铺都逐渐形成了较为严格并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的商业行为规范;老北京商人在经营中还处处体现着浓浓的人情味,把友情的相互渗透、彼此交流作为维系良好生意的最佳方式;作为著名的文化古都,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自然造就了京商浓厚的文化底蕴。

老北京是一座消费城市,是五方杂处、人文荟萃之地。在元朝,大都人口就已有数十万,为解决吃饭问题,每年要通过运河和海运从南方运粮一百万到三百万石。至清朝光绪年间,八旗人口即达20余万,他们“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完全靠政府养活。在北京这座以官员贵族为主的消费城市中,保证供应,服务宫廷是经贸事业的主要任务,而商人、手工业者也将为皇帝、官员、贵族服务作为谋生、赚钱的主要目标,于是先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手工业作坊与商号,其经



营范围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如药店茶庄、饭店小吃、食品百货、文化娱乐等各行各业。其中有些店铺商号世代相传,名声越来越大,被人们称为“老字号”。应运而生,与时俱进,济世养生,满足官民之需,是它们创业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名牌意识,绝技绝活,一招仙吃遍天,是它们成功的主要诀窍;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合股或独资经营,世代相传,是它们主要的经营模式;以质量求生存,以技艺超群求发展,“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他们世代相传的座右铭和职业道德。它们是老北京帝都文化的缩影,其经营观念、商业道德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如今,这些老字号商号不仅在服务首都、带动全国乃至影响海内外方面大显身手,而且成为北京文物古迹旅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内外游客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8. 皇家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

皇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封建文化的发展方向。天人合一、敬天法祖,唯我独尊、专制独裁,典雅豪华、奢侈腐化等,可以看作是皇家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北京的文物古迹可以说是中国皇家文化的缩影,尤其是那些独一无二的皇家建筑宫殿坛庙,别具一格的皇家园林、帝王陵墓等,更是国内外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或望尘莫及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

9. 文学艺术特色:百花齐放,名传天下——京味、京腔与京剧

中国不仅是一个诗的大国、散文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小说的大国、戏剧的大国。北京的文学艺术始终处于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北方重镇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的文学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最早的文学记录《燕丹子》,唐人《玉集》中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记载,《山海经》中的文学描写,《史记》中关于幽州、长城沿线的文学描写包括“李将军射虎”等,建安文学时期关于蓟城的文学艺术如曹操的《苦寒行》、《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陆云的《北游幽朔城》,唐代的幽州文学,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高适的《蓟门行》等,无不体现祖国的北国风光,反映了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发展到辽、金、元时期,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因素进一步明显和加强了,比如辽代的幽州文学,苏辙的《游桑干》《眉山集》,金代的诗词、诸宫调、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诗词以及书法、绘画、歌舞、佛道诗文等,元代的名诗《黄金台》、元代著名诗人刘因、王冕、萨都刺、虞集等人的作品,元大都绘画、小说、讲史以及宗教作品等。明清则形成了带有北京地方特色和民族融合特色的京味文学,包括《金瓶梅》中的北京语、《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京味、京腔,子弟书,京味小说《镜花缘》以

及说唱艺术等。

北京的戏剧从元杂剧的辉煌、明清传奇的鼎盛、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的五彩缤纷,分别代表着中国戏剧史上三个黄金时期。北京地区戏剧的发展则与这三个黄金时期息息相关。比如宏大壮美的元杂剧,从元曲第一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到《西厢记》,马致远、纪君祥等人的剧作,昆曲艺术扎根北京,盛世元音,南洪北孔,花部的地方戏,徽班进京,京剧的形成,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京剧生行、净行、丑行的表演艺术家等,无不反映北京地区戏剧兼容并包的特色,同时在全国各地又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

10. 育才选才特色:“学好文武艺,售予帝王家”

学校与书院是中国古代到近代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京师文化与地方文化传播与交汇,古老文化与近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沟通的场所。古代的北京官学发达,辽、金时期的官学即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色;元明清的国子监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而地方官学、八旗子弟学校等也很有影响。学校为科举服务,“学好文武艺,授予帝王家”是北京地区育才选士的主要特点。但自古以来,北京地区书院很少,它反映了天子脚下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不允许异己思想和民主思想传播。但在近代,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北京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却迅猛发展,很快就成为全国的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和学校最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最高学府。北京的学校教育既是全国学校教育的中心,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2006年12月8日,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与北京学研究所、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北京学第八次学术研讨会暨北京文化史论坛”在首都博物馆新馆隆重举行。这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学术盛会,它既是对北京文化史进行分类研究的一次很好的总结,也是为“人文北京”、“古都保护”出谋献策,为“人文奥运”添砖加瓦。出席此次大会的除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物局的相关领导外,文物考古学界著名专家徐苹芳先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先生,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先生等,共有108位专家学者和近百名学生及工作人员参加,收到论文70余篇。此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它涉及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北方和北京物质文化史、北京地区考古学研究,北京文化史的特色与内涵,清史编纂与北京历史文化,首博新馆陈列的特色和博物馆建设,北京地区的民风民俗史,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和城建规划的文化内涵,北京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宗教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现象,北京地区的文学、戏曲史,北京的学术教育史,北京历史上商业